

卢作孚：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

□ 张守广



卢作孚是以建设奇才、管理名家、对国家社会贡献巨大著称的近代爱国实业家，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在1953年特别提到的四位不应忘记的实业界代表人物之一。

成为青年知识精英

卢作孚（1893—1952年），四川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人。由于出身贫寒，卢作孚仅接受了小学毕业程度的正规学校教育。1908年，15岁的卢作孚得到亲友少量资助，从合川一路步行前往四川省会成都。由此，他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自学，卢作孚不仅能够胜任中小学的数学、国语等科目的教学工作，还编著了多种中学数学习题集，其中《应用数题新解》一书由重庆中西书局于1914年出版。

1914年到1915年间，卢作孚一度走出夔门来到上海。在上海，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了解各种新事物。新文化运动期间，卢作孚以报社记者和《川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成都舆论界崭露头角。1921—1922年间，卢作孚应邀到川南的泸州担任永宁道教育科长，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新川南”建设浪潮。其间，他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的主张并付诸实践。

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主张以川南师范学堂入手，打开校门，打破教科书的生硬内容模式，使学生和自然与社会接触，进行新教育试验。通过友人，他成功邀请恽代英从武汉入川，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教务主任兼国文课教员。在社会教育方面，他先后创办了县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新川南日报》等，并组织成立通俗教育会，组织各种文化、卫生、体育活动，开展民众教育。由此，卢作孚成为泸州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支柱之一。

战胜外商轮船

1929年7月，卢作孚受命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负责重庆港港务管理。他决心对进出重庆港的中外轮船实行统一管理，但外商轮船尤其是日本日清轮船公司极力反对。既然日商轮船拒绝接受检查，卢作孚就动员码头工人，拒绝装卸不接受检查、管理的外轮货物。日清公司在重庆港的业务无法开展，只得接受川江航管处的管理和检查。卢作孚能够不动声色地迫使骄横的外国船商接受中国地方当局的检查和管理，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

从1931年开始，民生公司开始了川江华商轮船公司化零为整的重组事

业。到1934年上半年，此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重庆上游航线只剩下民生公司一家，但重庆下游航线仍竞争激烈。

英国太古、怡和等外商公司，从1934年3月起争相调低运费。结果，一件棉纱从上海运到重庆只收2元运费，一担海带只收2毛5角运费。运费之低，不足以补偿船用燃料及转口费用。面对此种情形，有人预计美国捷江公司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必将在当年倒闭。其中，捷江公司的资本超过民生公司数十万元，其营业性质和所走航线恰与民生公司形成竞争。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于1935年6月收购了捷江公司的大部分轮船和岸上业务。以此为标志，民生公司在统一川江航业的进程中取得决定性成功。

卢作孚用成功的经营实践证明：“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与管理，便能做出他们的事业。”此后，民生公司进入建造新船、扩大规模的新发展阶段。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卢作孚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八一三”战役爆发后，正在南京参与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卢作孚告诉民生公司的管理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于是，民生公司派出大量船只，负责从上海、南京等地把人员物资转运到大后方。

由于江阴长江航道实施封锁，民生公司派出的大型船只主要集中在芜湖和镇江两处。集中在芜湖的船只主要是装运兵器器材，集中在镇江的船只主要装运来自上海的迁厂器材和机料。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人员和办公物品以及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动员起来的民生公司不仅抢运内迁的人员和物资，而且大量运输部队和輜重到抗战的前线。

民生公司主要从事长江上游川江一线的水运，而宜昌是长江中下游轮船进入川江的咽喉。货物器材从中下游运到宜昌后，均须分转，由川江小轮船装运入川，行驶宜昌上下的轮船，载重量全然不同，造成抗战爆发后等待转运的物件大量滞留。武汉沦陷后，蜂拥而来的人员和货物使宜昌运输中人货滞留情形更加严重。滞留宜昌港的人员多达3万人，滞留的货物多达9万吨，其中许多是事关抗战能否持久进行的兵工器材和相关物资。

这时，卢作孚以国民政府长江水上交通行政最高主管身份，来到宜昌坐镇指挥。经过一番调查和研究，他迅速制定出统一分配运力、区分缓急、分段运输、动员木船参加运输的抢运计划，并宣布立即实施。新办法实施后，运输秩序大为好转。在长江枯水期到来前的40天中，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大部分物资被抢运入川。这一场由卢作孚

组织实施、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被认为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大公报》著名记者，同时也是地下党的徐盈后来也说：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和创造，宜昌抢运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

从新升隆轮到民安产物保险公司

卢作孚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作者。国共双方关于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当时改组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是清除其中的亲日分子，增加主张积极抗日的人士。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卢作孚成为拟议中的实业部长人选，并得到国共双方的认可。

根据曾为地下党的萧林回忆，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党组织曾经找人向他讲，武汉新华日报社有一部分印刷机器需要运到重庆，以备将来使用。他把这件事向当时身为水上交通行政最高主管的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同意派一条专船装运新华日报社的机器，很快，新华日报社就租到了由水陆运输管理处指派的新升隆小火轮。10月22日晚，武汉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10多位工作人员在李克农、潘梓年的带领下，乘坐新升隆轮离开汉口，向重庆进发。开船前，又免费搭载难民妇孺50余人。

1943年11月，民安产物保险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资本1000万元，广大华行和民生实业公司各占半数，卢作孚为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任协理。杨经才病逝后，卢绪章为总经理。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华行实际上是南方局领导下的以实业作掩护的地下工作机构，卢绪章更是著名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主人公的原型。卢绪章后来回忆：广大华行作为私营商业企业创建于1933年，后来业务逐步拓展，我们党认为这是在大后方里一个值得利用的机构，从1939年下半年起，广大华行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通过开展贸易业务，秘密为党筹集经费，掩护地下活动，1943年，我们还同原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合作，创办了民安保险公司，这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华行的声誉。

参加新中国建设

1948年春，卢作孚领导下的民生公司开始加快向沿海南线的发展，并恢复了香港办事处。7月，民生公司成立广州分公司。1949年1月，卢作孚开始将民生公司和代理太平洋公司的海轮及大型江轮，陆续集中到香港。3月中旬，民生公司香港办事处扩充为香港分公司，直属总公司领导，对外称香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开辟和经营东南亚航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订购的轮船先后到达香港。

1949年8月中旬，卢作孚通过一些可靠的渠道表达了愿意北归的意

愿。但民生公司的民众、民本、民俗等轮仍滞留台湾，而且加拿大借款仍由国民党政府担保，考虑到这些因素，卢作孚决定仍暂留香港。之后，卢作孚又打算在1950年2月中旬离港北归，但由于港埠船上和岸上职工需款迫切，致使卢作孚仍未能按计划离港。

3月，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派驻北京的代表何乃仁向周恩来汇报民生公司情况时，提出公私合营的问题。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经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同意接受卢作孚的请求，并指示有关方面一定要慎重、稳妥地做好这件事关大局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典型，为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提供榜样和经验。此后，何乃仁根据周恩来指示，两次到香港安排卢作孚赴北京事宜。4月，卢作孚召集香港民生公司高级职员拟定了轮船北归的行动方案。6月，由何乃仁等陪同，卢作孚经过深圳乘火车到达北京。

在京期间，卢作孚先后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民主人士举行的便宴。周恩来和陈云也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朱德曾在中南海宴请卢作孚，吴玉章、张澜等也热烈欢迎卢作孚归来，黄炎培、孙越崎等老朋友更是与卢作孚多次晤谈。此后，民生公司滞港的18艘轮船中，除太湖轮在自香港开往上海途中被国民党海军扣留开往高雄外，其余17艘轮船，均得以冲破重重阻碍，安全驶回大陆境内。

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

在北京，卢作孚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其间，卢作孚还与有关方面谈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初步方案，卢作孚还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卢作孚寄予了满腔热情 and 希望。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卢作孚出席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他热情洋溢地表示：听了各方面的报告，深感西南各方面的工作，在1950年中有非常迅速的进步和非常显著的伟大成就，相信1950年工作的成就为1951年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他坚信：“进步总是加速度的，1951年工作的速度，必比1950年更为迅速。西藏必完全解放，我们的五星红旗，必插在世界高原的边沿上，或竟插在世界的最高峰上。不但从此完全解放了大陆，还要进一步集聚西南的人力物力，支持解放残敌最后盘踞的台湾，打破海口的封锁，解放数艘数十万吨的中国轮船，让我们的中国轮船，让我们的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面。”卢作孚的发言，表达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对祖国进步事业的美好祝愿和信心。如今，悬挂五星红旗的中国远洋巨轮早已在世界各大洋自由驰骋。卢作孚远洋航海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地位的

□ 顾春

在西周，周天子通过分封制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又通过宗族长来统治各自宗族的人民。其中，分封对象体现的是尊，宗族治理体现的是亲。就这样，周朝最高统治者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通过制礼作乐，建立起统治秩序。

西周的这些治国思想，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继承。孔子的核心思想一说是仁，一说是礼，二者其实是统一的。没有仁贯穿于礼，则礼就变为简单的礼仪，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不能发挥教化作用；而没有礼，则仁无从寄托和表达，等级制度无从建立和维持，也失去了教化的有效办法。孔子仁和礼的思想，与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自己说经常梦见周公，并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入学思想，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到了孟子，他提出了“五伦”，也就是全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并提出了处理这五种关系的原则，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孔孟的思想代表了儒家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格局和气象。所以宋元以降，人们常把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而孔子、孟子又都生于群雄争霸的乱世，所以他们的思想久不见用。大凡治国的思想，都必须是道理上讲得好，而现实中又行得通才行，这就是孔孟之道何以不用于当时而又长用于后世的原因所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秦王朝只维持了15年就灰飞烟灭。有鉴于秦亡的惨痛教训，在西汉建立之初，陆贾就向刘邦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去之乎？”意思是用武力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而之后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又进一步指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朝在不施一天下后，继续滥用武力而不施仁义，因而导致失败。于是，公元前134年，在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终于采用了当时的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和全社会的主流思想。汉武帝之所以这样做，董仲舒的以下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儒家讲德治，但“独尊儒术”的意思不是说治国只靠儒术、只讲德政，而是实行恩威并举、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儒法合治，并行不悖。这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为了更好地贯彻儒术，统治阶级对儒家思想的内容作了更加清晰的厘定。公元79年，汉章帝召诸儒于洛阳的白虎观，并亲自主持诸儒对儒学经义异同的争辩，据此成书的《白虎通义》系统提出了“三纲六纪”的道德伦常，而著名经学家马融又首次将“三纲”与“五常”并称。“三纲五常”理论的系统化，标志着统治者所认可的儒家政治伦理体系的初步形成。

经过董仲舒等汉儒和统治者的改造，汉代的儒家思想还在其他两个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二是忠孝的思想。大一统，也即以“一统”为大、为尊。在春秋时期，一统指的是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统引申为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文化上的高度集中。而忠孝的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形成。到了汉代，儒家把忠孝的思想突出出来，其标志是《孝经》的出现和流行。《孝经》分别讲了孝的基本理论、孝的实行办法，并规范了从天子到庶人的五种不同之孝。它的贡献是，十分明确地从天地人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根据，反复论证了孝在教化百姓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以孝治天下”和“移孝作忠”这两个持续而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主张。于

是，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大多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也被后来的统治者不断提倡和推行。总之，以孝为德、以孝齐家、以孝治国和移孝作忠、忠孝一体等思想，都为后来的统治阶级所继承，并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价值观念，因而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评论人的品行时，往往还会这样说：他对自己的爹娘都不孝顺，还能对别人好吗？

在历经先秦的滥觞、两汉的沉潜和隋唐五代的酝酿之后，儒家思想迎来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宋代理学（道学）的产生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理学是汉唐以来儒学的集大成。它在吸收佛道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地创造了内容极其丰富、逻辑极为清晰的思想体系，并以具体大至精神、影响至巨登上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高峰。宋代理学家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理，这些理应天而生、自然就有，所以叫天理。天理只有一个，它散入万物而成万物之理。万物之理虽有异同，但本质还是这一个天理。一如夜晚不同的河流都有月亮的影子，但这些影子都来自天上的月亮，这种现象叫“月印万川”，这个道理叫“理一分殊”。“理一分殊”的天理表现在人身上就是仁义礼智信，在这其中，仁是根本。道学认为，天有道，故人也有道。在道德的内容上，主要还是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仁义礼智信等。其核心是处理君臣和父子关系的忠孝。而衡量人是否道德的关键是看其动机是好的还是坏的。因此，义利、公私之辨最为紧要。在人性上，既主张人性本善，又认为人有欲望，欲望超出其应当便为私和恶，这就是人欲。因此，人生就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人应该不断读书明理、一生修养不息。人通过修养而使自己从自私中摆脱出来并成为有道德的人，就能进入到做人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能有一种他人难以体会也难以企及的最高幸福。道学的这些思想成果是在不同学者的迭相争鸣、激烈辩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其中，最著名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到了明清时期，朱熹与其之前的北宋“二程”的思想并称为程朱理学，陆九渊与明朝王守仁的思想并称为陆王心学。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推广和弘扬理学的这些思想成果，就形成了礼教，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培养百姓道德行为的工具。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 郝玉明

秦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相比先秦时期的世官制有所进步，但强化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行政长官的选拔用人权，一方面威胁了中央集权和皇权，另一方面导致了选拔用人标准形同虚设，选拔官员作弊腐败盛行，加剧了党争形势，造成了东汉末期的政治黑暗和军阀割据局面。在曹操适逢乱世“唯才是举”用人理念指引下，开始探索创建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适应社会政治发展需要应运而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

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央政府统一

设立中正官及其属吏品评人才，依据世、状、行三大标准，将人才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以此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依据。中正官是由中央选派的专门负责人才品评和选拔的人事官员，由中央政府吏部进行统管，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州一级的为大中正，郡县级的为小中正。中正官通常由品级较高的官员担任，从现任官吏中选派。中正官品评人才依据世、状、行三个方面标准：“世”是家世出身，是对人才的门第出身、家庭财产及地位等进行审定；“状”是

才能表现，是基于“唯才是举”理念对人才的才能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行”是品德品行，是对人才的政治品德进行考察品评。

九品中正制依照一定的程序选拔推荐人才。先是小中正每年一次依据世、状、行对人才进行品评，评出有别于官品又和官品具有对应关系的“乡品”，推荐给大中正，再由大中正向中央推荐，最后由吏部依据“乡品”高低授予官职。由于是依据“乡品”高低决定授予官职高低，故对“乡品”等级评定十分重视。除了每年一次例行品评外，还有“三年一清

定”，对人才品级在例行评定基础上进行复评调整，以提高“乡品”等级精确性，从而提高官员选拔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